



□ 谢 天

在清代早期，儒学内部兴起了一派反对坐而论道、重视实践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颜元（号习斋，1635—1704年）。在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颜元集》中，汇集了颜元实践思想的精华。书中的力行观对后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颜元集》中的名言“圣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勉励青年力行所学。颜元实学的精华，使我们至今受惠。

实践哲学下的人性观

在人性论方面，颜元特别反对官方的朱熹哲学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做法，而将人性统一归为朱熹所谓的“气质之性”。这体现了颜元思想的“气一元论”特征。朱熹把和感官欲望有关的性都归于气质之性，认为“性如日月，气浊者如云雾”“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理学主张人的感官是气质之性恶的源头。而颜元以此为其批判的焦点。颜元认为，人自身的感官并不会引导向善性恶发展。他以眼睛这一器官举例道：“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颜元之后的思想家戴震主张人性情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颜元也主张人的气质之性本身性善，但颜元更强调气质之性中人的能力的维度，人的感官和器官本身具备实践的能力，这是人性善的来由。颜元强调：“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

颜元把人的本性界定为能力，这使他的理论中人性的范围得以丰富。人的本性是能力的产物，这意味着人性更多是后天得来的，因此人性的各种可能性极其丰富。所以，就像水能够使人溺毙，但这并非是水化的罪过一般，人性中恶的一面并非是像朱熹那样认为的是感官本能所带来的，而是外界的影响所致。颜元将其称为“引蔽习染”。他这样论述道：“耳听邪声，目视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视听之罪也，皆误也。皆误用其情也。误始恶，不误不恶也。引蔽始误，不引蔽不误也。习染始终误，不习染不终误也。去其引蔽习染者，则犹是爱之情也，犹是爱之才也。”

在颜元看来，人性主要受外界影响所致，而外界影响有可能是恶的，但依此逻辑，外界影响也当然可能是善的。颜元学说的精髓在于，他并不认为这个外界影响是不可改变的，外部环境是可以通过人來主动塑造的，而这个行动用颜元的话说是“习于其事”，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实践”，颜元主张通过主动塑造环境来改造人心，使人心人性达到理想的境地。只有力行，才能“治心”。他强调：“人心，动物也。习于其事，则有所寄而不动矣。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

因此，颜元的学说中不抽象地看待人性，认为人性是变动的、待塑造的。力行实践之所

以是儒学的应有之义，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基于此，颜元严厉地批评理学和佛教等思想派别离开实践和实事谈养性的倾向。理学和佛教强调静坐，都是试图通过使人心脱离外界影响的方式来修身。他认为“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正是因为“理”的超验性，导致理学是脱离实践而谈理的，因此理学才会通过静坐等方式修养身心。当“理”的超验性被打破，实践的重要性也就被凸显，正基于此，颜元进一步痛陈沉溺书本而脱离实践的危害。

那么，什么样的实践能够形塑优良的人性？颜元给出的解答是礼乐。他认为“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情性，长人仁义”。具体而言，颜元将“三事三物”的实践修习作为塑造完美人性的最佳途径。“三事”源自《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指的是《周礼·大司徒》所阐发的“乡三物”，包括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颜元在自己设立的漳南书院中亲历亲行，不再以书本教育为主，而肯定了以礼乐实践为主的教育方式。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实践，是其模仿的范本。

颜元实践观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超越

如上文所述，颜元充分地发挥“气一元论”儒学中的时间维度。众所周知，阳明心学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影响甚巨，但笔者认为，颜元的重要实践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带来的影响也迥异。在程朱理学中，理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朱熹可以将知和行分割，以单纯认识论的角度探求理。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道德的标准在于本心的良知，本体和工夫合二为一，道德实践和道德认知便不可能割裂，因为良知是知和行统一的主宰。因此，在阳明心学处，之所以重视实践，是因为实践是本心良知的自然结果。而颜元重视实践的原因则正好相反，颜元把实践作为改造人与社会事物的手段，强调人性是通过实践改造的。因此，相较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颜元的实践论更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而颜元的实践比王阳明的“行”范围更要宽广，涉及了包含人伦日用在内的所有社会事物。其理论结果必然是对政治改革的强调。而阳明心学的实践观难以达到对人性和社会的改造的高度。颜元实践观中对人性的可塑性的乐观、强调用实践去改造人性、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强调等方面均是其对心学实践论的超越之处。

复古之弊：颜元实践思想的缺点

颜元虽然发展出了丰富的实践思想，但

其实践观念却是超历史的，这不能不给他卓越的实践理论带来缺憾。颜元的理论也难以做到历史地看待人性。他认为上古三代的道德、礼仪、政治实践是最为完美的，因为在三代和孔子那里，“学”和“习”是统一的。所以颜元把历史的下降归结为思想史的堕落。他如同大多数儒者一般，将三代视为理想的黄金时代。

颜元将历史的变迁归结为思想史的堕落，他认为秦代焚书坑儒，导致了儒家经世学问的沦亡。到了汉代儒学复兴时，已经“圣学之体用残缺莫振”，但是汉儒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孔子的实践精神。然而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道家、佛教相继兴起，在重清谈、辞章的潮流影响下，思想界又极度忽视实践，因此儒家重实践的优点逐渐沉寂下来。宋代以后，理学家力图振衰起敝，复兴儒学，但却借鉴采用了佛道二家的心性论，提倡静坐或顿悟的修身方式，完全没有继承先秦儒家重实践、实学的优点。颜元将宋儒的缺点概括为“宋人则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牵释老附会六经四子中，使天下迷悟……致普地庠塾无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职位无一济世之政事”。

颜元认为，只要回到三代和孔子时思想、实践的有机统一状态，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人性和良善的政治秩序。所以颜元的思想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他的一切主张都向上古三代看齐，无论是他的修身实践观还是井田、封建的政治理想都是以三代为蓝本。由于颜元思想中历史维度的缺失，这种理想实践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太过遥远，单纯试图依靠礼乐习行就能拯救人心与政治的堕落，未免太过单纯。因此其主张有时显得迂腐陈旧，正如钱穆所指出的那样：“今习謠言经济，多混之以礼乐；言礼乐，多本之于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让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为主，并未深发当时切用之意。”

因此，颜元的实践只能处处以儒家经典所记载的礼乐习行为依据。虽然他重视实践，但在怎样通过实践实现怎样的理想社会上，十分缺乏想象力。

瑕不掩瑜，虽然颜元的实践思想存在复古之弊，但是他的“实践塑造人性”的主张可谓振聋发聩。马克思有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实践这一点上，颜元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相近之处，毛泽东从青年起推崇颜李学派，他说“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颜元思想在近代的发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近代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五代至北宋初年有一位著名的清官廉吏——刘温叟（909—971年），字永龄，河南洛阳人。他出身名门，是唐朝刑部尚书刘政会之后，门下侍郎刘崇望侄孙，7岁时就能写文章，擅长书法。他为人厚重方正，举动遵循礼法。历任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五朝，官至御史中丞，他长期在朝中身居要职，总是能坚持清正廉洁。

刘温叟主政的御史台，是当时全国最高的监察机关。御史台有个惯例，在俸禄之外每个月都要给所有官员发放名为“公用茶”的补贴，如果办公经费不足时也要用办案查缴的赃款或者罚金来足额补发。刘温叟是御史中丞，他的职务每月理应得一万钱，但他非常反感这类补贴，刘温叟在御史台任职12年间，从来没有领取过类似补贴。他多次上书请求辞去此职，但宋太祖认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担当此任。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刘温叟病重时，宋太祖实在不忍心他这么清贫，就赐给他一些家用器物 and 钱，帮他治病。仅几个月后，刘温叟就与世长辞，终年63岁。

查阅史册，作为清官廉吏的刘温叟，一生接受过三次特殊的“送礼”。

母亲送他父亲的官服和金带——重振家风

刘温叟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女性。他侍奉母亲十分孝顺，远近闻

名。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刘温叟刚出任翰林学士，立即回家拜谢报告母亲。老夫人当场命令家人奏乐，让两个女婢抬出一个木箱，她亲自从箱中拿出一套官服和一条金腰带，老太太把官服和金腰带高高举起，对儿子刘温叟说：这一套官服和金腰带是你父亲在后唐长兴年间担任翰林学士时，当时皇帝给他的御赐之物。自从你父亲英年早逝后，我总是担心我们家门第衰落。如今，我儿你在社会上无依无靠，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达到人生的理想高度，担任你父亲当年的这个职务，为娘我备感欣慰。现在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穿戴上你父亲留下的官服、金带了！

母亲话没说完就泣不成声，用衣袖掩面哭泣。刘温叟听罢，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然后，他就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穿上朴素的布衣、吃着简单青菜，经过好几天对父母亲感恩、对人生的思考后，刘温叟终于穿戴上父亲遗留的官服和金带。官场和读书人都称赞刘温叟能继承父志、重振家风。

刘温叟“收礼”

□ 王丹誉

学生送他一车秸秆——加倍回赠

虽然刘温叟连续很多年都担任位高权重的官职，但是日子却过得一天比一天清贫。后周显德初年（954年），刘温叟升任礼部侍郎，主管全国科举考试。刘温叟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任国子四门助教，河南府文学，还当过国家最高学府的长官——国子祭酒。所以，他门下的学生自然不少。其中，有个专门向他求教儒家经典的学生，其家就住在京城近郊。那年，收获完庄稼后，这个学生就给老师刘温叟送一马车收获过小米后剩余的秸秆，想让老师冬天烧火取暖，没想到却被刘温叟谢绝了。

这个学生对刘温叟说：老师，这秸秆是我家自己种庄稼收获了粮食之后剩下的，我们农村根本用不完，您在城里没有地种，也就秸秆可用。所以，我就送给您这些秸秆，也算是对老师您

5月2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对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科研成果的教育和普及等作出了重要论述。

中华文明的探源工作是一项“立体式”的系统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以及诸多人文和自然科学。如考古遗址年代学的建立，以往是通过地层、器物排队等推定年代早晚建立“相对年代”；后来，考古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用于考古测年，20世纪末国家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大量采用测年技术，将考古年代测定推向了更高的水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学者们将超高灵敏度的加速器质谱技术应用于碳十四测年，极大推进了考古测年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又如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应用于人群以及动物群体迁徙的研究，仰韶文化马家窑遗址发现了不少的牛、羊卜骨，学者们根据对黄牛DNA序列的分析，认为是由西亚传入的。同时，通过Y染色体、线粒体和核基因组遗传标记从父系遗传、母系遗传和基因组全面解析了现代中国地方黄牛群体遗传结构。这些结论对我们更为准确地探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商代，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诸多考古遗址中都有牛骨、羊骨，说明古代中国的畜牧传统与中亚文明有着密切相关，展现出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多学科充分参与，使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取得了更多“精准”的数据，获得了更多让人信服的成果。

要通过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一步体现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性、原创性和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工程启动20年间，围绕公元前3500—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如良渚文化遗址，在2007年发现了有近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2016年考古学者又发现了距今5100年到5000年前的，长数公里、宽十余米的巨大防洪堤坝，是中国迄今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种种迹象说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早期文明。2019年春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受教育部邀请参与修订初中教材时就建议将良渚已进入早期文明添加进去，这个意见最终得到采纳。虽然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许多高等学校正在使用的教材尤其是历史教材却长期没有更新，有的停滞十几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成果自然未能吸收进来，更不用说近几年国家文物局实施的“考古中国”重大工程取得的重大成果的采纳。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教材体系”的建设仍旧是刻不容缓的。高等学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好考古学、历史学专业的科研作用，聚集人才，把专业成果运用到教学中来，积极推进利用中华文明起源工程等成果的育人工作，这项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全力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教育和普及工作

□ 代生

视文物保护，多次就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指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为此，国家就推进文物保护、古籍整理工作等建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确保这项工作顺利实行。其中，中华文明起源工程中发掘的重大遗址就是鲜活、生动的教材，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建立遗址公园、文物展览馆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引导群众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教育和普及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既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全力以赴；也需要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并肩作战；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也才能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洁清正，日子过得很清苦，就派人送给他五十万钱补贴家用。刘温叟思考再三后才接受，他让人用一顶大柜子把这笔钱封存起来放到御史台正堂西侧的过道。有人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温叟就回答说：晋王本是亲王爵位，又兼任京城长官，更何况他亲哥是当今皇上，我如果拒收那就很不礼貌；但我是监察官，如果接受并使用了这笔钱，那如何让官场上的清廉名流评论啊。

次年端午节，晋王又派人给刘温叟送去角黍、执扇等时令礼物，此人正是去年送钱的那人，他看见晋王去年派自己给刘温叟送的那笔钱，还在原地不动，钱柜上的封条和标记也是原封未动。此人大为感动，回来就立即报告晋王赵光义。晋王感叹地说：连我送的钱，他都不肯用，更何况他人送的钱？当时，他接受这笔钱，是无法拒绝我；如今过了一年仍然原封未动，他清正廉洁的节操越发鲜明了。于是，晋王命令手下把所送的钱物悉数送回。当年秋天，晋王赵光义在后苑侍奉宋太祖大宴，在谈论当世著名的清廉之士时，详细讲述了刘温叟以前的事情，宋太祖再三叹赏。



建隆元年（960年）北宋开国，百废待兴，开国皇帝宋太祖任命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不久，刘温叟因母亲逝世而回老家洛阳居丧。但朝廷夺情，请他继续担任御史中丞。刘温叟虽然官居御史中丞，但家中日子过得极为清贫。当时，宋太祖在位时期，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晋王兼任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久闻刘温叟的廉